

中國改革的關鍵

——行為轉變的 J 曲線

浸會大學經濟系 曾澍基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

印象深刻

最近往上海跑了一趟，印象深刻倒不在城市面貌（那當然非常壯觀），而是日常接觸所感到的行為變化。酒店服務態度一流，操流利普通話的經理原來是位日本女士；坐上計程車，竟自動播出歡迎話語，並告之投訴熱線號碼。天雨路滑，的士在紅燈前闖越白線兩呎，穿制服的交通警察從容宣讀規條，罰二十元加扣一分，司機卻滿臉歉意，害得我同情心起，願送還罰款。

一位挪威教授過港與我會面，也道出同樣經驗：在北京新機場消費七十元人民幣，問女侍應可否以美元付款，說可以但卻要求十美元。教授不想以匯率相質，惟五分鐘後，明顯受經理教訓一頓的女侍應慘兮兮地再來，把確切數目的零錢奉還；教授倒喜出望外。

改革中行為轉變的 J 曲線

任何一個從上而下的改革，總是始於政策、制度（因為那屬政治決定），繼及硬件、軟件，最終擴散至人的行為。但人性善惡交融，改革過程中的行為變化，往往「先墮落後昇華」，我稱之為 J 曲線（J Curve）。靈感無疑來自匯率經濟學：貨幣貶值，出口會先苦後甜。

八十年代港人往國內旅行、做生意，都有種種痛楚：以往「為人民服務」的純真在散、熱情退減，但效率機制未存，消費者權利難彰，不少企業於空隙

中半死不活地浮沉。領導層只能改變外部環境，眾多個體卻需時間適應。傳統高壓既除，新的制約還沒建立，懶散、貪污、腐敗乃容易向四周擴展。

當然，改革令「配置效率」和「技術效率」出現了大改進。況且，所謂行為的「墮落」亦非全面性，總有可「規範地利誘」的人、適應較快的人、以及安份守己的人。結果是，改革帶來的效率提升，抵消了行為轉化滯後的負面效應。事實上，不單是抵消，而是大幅地超越。國內的「經濟奇蹟」就建基於此。

但向前看，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，經濟的起飛沒可能不倚靠人的素質的提升。無論企業體制如何改革，吸收的外資及技術縱多，人的行為不變，振興中華就無希望。可幸的是，行為轉化的 J 曲線，近幾年有些捱過谷底，開始向上爬升的跡象。

□ J 曲線的背後

我不想美化這個趨勢。上海的橫街窄巷，隨地吐痰仍十分普遍；而廣東、福建——不要說內陸——的貪贓枉法現象還有待大力整頓。農村人口素質的改善，更是遙遠漫長的過程。但公正的觀察者可以見證，一般民眾以至企業的行為，真的是趨向文明。過往十多二十年的政策、制度、硬件及軟件的變革，看來終於產生深層作用。

某種程度上，這是「發財立品」。珠江三角洲各個城市大搞專上學院、書城、以至高科技；上海民眾對城市建設感到驕傲；北京服務員自覺紀律壓力；皆屬其例子。

另方面，宏觀經濟形勢的變更形成了催化劑。八十年代的「短缺經濟」，演

化為九十年代的「剩餘經濟」，對企業及其顧員的壓力攀升，消費者的選擇不斷擴大。九三年中開始的宏觀調控與九四年的財稅、金融和外匯改革，營造了一個相對地「緊迫」的環境，也加快行為轉變。

九四九五年的一系列金融措施，令銀行的信貸取向趨於規範，不再隨便貸款予企業，並須計較回報及風險。一時間，國企的業績指標大降，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則上升。一些外國的專家吃驚，個別甚至認為中國的銀行—企業綜合體面臨破產！在幾年前一次討論會上，我已指出 J 曲線的問題：銀行收緊信貸，企業表現指標自然趨劣，但適應之後可能有所改善。這就是先苦後甜。

行為改變能否持續？

我並非說「先苦」一定會「後甜」，但單針對靜態指標而忽視改革的動態效應的分析，意義實在不大。

中國看來很快便會加入世貿組織。這必然對外貿範疇的行業，在行為上形成新的規範和沖擊，此所謂與國際接軌。但其中也包含風險。如果開放面太大、速度太快，可能只有少數的企業和民眾跟得上，大多數的行為會出現反覆甚至倒退，致令傳統主義、保守力量回朝。J 曲線變了倒寫的 N 曲線。歷史並不缺乏同樣例子。

說到底，中國的改革乃「漸進模式」的典範，比起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「大爆發」、「震盪療法」明顯地優勝。關鍵是它給予民眾及企業足夠的時間及誘因，作出行為的調整；而且從易到難，達至屢戰屢勝的良性循環。這個歷史的教訓，中國的領導層應該不會忘記。

另一類的 J 曲線

不單行為轉變有 J 曲線，人的需要的演化也有 J 曲線。傳統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在改革後淡出，「向錢看」、唯利是圖，成為了時尚。人們好像從天堂回歸塵世，營役征逐。但經過一段時間，衣食足然後知榮辱，需要又會再度昇華。

於是，各樣新的追求與訴求不斷繁衍，伸延至文化、社會以至政治範疇。那天晚上，漫步上海灘頭，極目浦東西兩岸超現代的金碧輝煌、跨世紀的建築喻意，我突然有種感覺，另一類的 J 曲線正在中國展開。